

基于东方经验的民族、国家观念

——传统“中国观念”的现代阐释

陆 勇

(盐城工学院 社会科学部,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与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不同,传统“中国观念”是基于文化、历史、地理三者一体的整体国家观念。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是传统“中国观念”的核心。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冲突与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共同作用,构成完整的“中国观念”。

关键词:“中国观念”;民族国家观念;大一统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09)03-0016-05

民族国家理论及其衍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曾对近代以来的传统国家转型和近代国家建构产生过积极影响。在民族国家观念中,国家的疆土、人口、主权以民族来界定,国家产生民族,离开国家的民族是丧失了历史起源的民族。但在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在民族国家的理论及其衍生的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主流话语同时,其本身理论上的悖论及盲目移植带来的排异性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在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中,东方经验与西方经验都属可资利用的资源。中国具有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发展史,传统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建构经验,也可以为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找到一个全新的模式。因此,跳出民族国家的话语,从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巩固的角度,重新阐释传统“中国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一词在古代中国是一个代词,并非是一个专用名词,中国古代文献中,至少在“中国”一词“其起源于武王时期是没有疑问的”^[1],其后“中国”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地出现变化,不过大体以秦汉为界,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秦汉以前,“中国”一词是指“中央之国”、“宗主之国”、“万邦之国”,秦汉以后,“中国”一词主要是代指大一统国

家。传统“中国观念”是伴随大一统国家形成过程而逐渐产生的对大一统国家的一种认同观念。

在大一统国家形成以前,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是双重的,即对于自身所处的邦国的身份认同和对于“中央之国”的“天下共主”地位认同。夏、商时期,中国境内除了居于中央之国的夏、商王朝外,其周边“方国”林立,这些以“方国联盟”形式与夏、商保持关系的方国,奉夏、商为“共主”,通过派遣官僚到夏、商国家任职、接受“中国”册封、向“中国”提供军队和交纳贡品等形式,建立一种对“共主”的从属关系。人们既认同自身作为方国的成员,也认同“中国”作为万国的“共主”。西周建立后,周王朝“封诸侯、建藩卫”,实行分封制。分封制度使国家的政治格局因此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传统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的前身,即“封建统一”时代。首先,分封制一改“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的政治格局,使周天子“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2]。其次,分封制度确立诸侯与王朝中心的距离,初步形成以周王朝为中心的中原、诸侯、四夷的同心圆式的天下秩序和天下观念。第三,形成了王朝与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构成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3]的同质性制度礼仪。第四,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

收稿日期:2009-01-12

作者简介:陆勇(1966-),男,江苏苏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下不同的人群”^{[4]150}。“封人”重于“封地”,打破了历来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均势,使得“天下会于一”^{[5]26-28}。周王朝的分封制度试图以层层宗法关系,构建一个庞大的国家统一体,但是并不像夏商王朝那样极力将尽量多的方国部落容纳于自己王朝的旗帜下,而是将尽量多的王族成员分布出去,遍布于周王朝的势力所能够达到的最广大的区域”^{[6]269}。对于国家的认同仍然包含认同诸侯国与认同中央“天子”之国的双重内涵。

秦汉以后,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遍布各地的诸侯国变成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原来的“中国”变成了由“天子”绝对权威掌控下的中央政府,中央与地方通过中央集权的形式,结合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整体。这样“中国”逐渐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代称,国家认同的双重属性消失,在大一统体系中,人们对国家认同只有大一统国家认同,传统“中国观念”就是在大一统国家的逐步建构与完善中,逐渐形成与丰富起来。

“中国观念”核心是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它包含在传统中国文化、地理、历史三个层面上。

认同中国首先要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华夏(汉)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更多表现为中原文化的特点:即以华夏(汉)民族传统集聚的中原地区向四周辐射。其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形成的传统制度文化是传统中国维持多民族国家统一体的文化要素,它包括“家国一体”的政治模式、“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严格规范的等级礼仪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庞杂的官僚体系、文化教育制度等等。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是形成传统“中国观念”的前提,传统中国无论是哪个民族统治大一统国家,首先只有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由于大一统中国形成于早期处于中原的“中央之国”,传统文化中心是以中原文化为源头向四方辐射,因而,在大一统国家形态中,中原始终是传统中国的核心地带。这样,就地理位置而言,只有中原王朝才有资格成为大一统中国的主宰,因而传统中国的改朝换代必须以“逐鹿中原”的形式,决定谁最终代表中国,行使统治权,取得合法地位。大一统稳定时期,传统“中国观念”本身包含着对中原王朝的认同观念。

传统中国各民族对大一统中国的认同是历史

形成的,这与大一统国家本身的形成、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在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大一统的边缘不断向外扩展,原先处于边缘的民族向中心内聚,处于大一统外部的民族不断地整合到大一统国家内部,尽管社会文化发展程度不同,但是都历史地形成了对传统中国的认同。传统“中国观念”的这种历史性,使得中原王朝在势力衰弱或者大一统出现内部王朝更替、纷争时,周边民族仍旧保持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而不至于从大一统体系中分离出去。

传统“中国观念”中的文化、地理、历史三个认同层面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构成传统中国完整的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观念。

二

传统“中国观念”的主体是由华夏(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国境内各个民族。在传统中国,尽管对于“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是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中原王朝“臣民”身份的认同,但是从整个大一统国家历史发展来看,各民族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是恒定的,王朝的更替不会改变民族成员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及其衍生的传统民族主义是维持传统“中国观念”精神动力。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境内各民族在形成与发展中相互冲突与融合,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民族”本身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由于“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7]3},民族认同并不是简单的民族国家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两个概念。国家认同是与国家合法性密切相关的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归属感。民族观念的基础是民族意识,所谓民族意识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群体中的个体,在其群体形成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地意识到自己归属于一个民族群体,并且有了这个群体共有的特征,有了对他事物的一些共识,这就是民族自我意识”^{[8]8}。一个民族在长期吸收、处理外部信息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民族观念,而民族观念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稳定性。不同的民族有自己不同的民族观念,就一个多民族国家统一体而言,各民族的民族观念是相互关联,并由此形成一个国家内各民族普遍认同的总体的民族观念。民族观念内容涉及族内、族际、民族与国家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其中族际关系形成了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在民族意识中居主导地位,它决定民

族意识的性质,但是又不直接反映民族意识的程度^[9]。民族与国家的忠诚、归属关系构成民族的国家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观念主要指这种民族认同及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所形成的基本观念。

作为主体民族,华夏(汉)族由于其所处优越的地理环境、拥有相对稳定的共同区域和占有绝对多数的人口资源,因而在文化话语上处于优势。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华夏(汉)民族的形成密不可分,体现早期国家初创时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华夏族的形成较早,从传说时期的夏族族源上看,它并不是一个单一族群。商族虽属东夷一支,但“其共同体也不是单一民族成分”^{[10]470},周人的族源与夏族是相同的,也是属黄炎部落后裔。早期族际冲突与融合形成了华夏族,同样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的建立,就华夏族而言,早期民族与国家在组织形式上基本是同构的,体现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的同一性^[11]。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生态环境相关。一方面,早期的民族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民族内部不同氏族、部落间的纷争促进了早期国家的产生,这样建立的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强;另一方面受经济水平的制约,民族在其早期形成过程,为获取生存资源,内在地要求民族内部的团结,以形成国家或准国家的组织。华夏族早期的国家形态体现出一种民族与国家间的同构。

传统中国的非主体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是西南一带早期的刀耕火种的民族。纵观民族形成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传统中国的非主体民族在族群数量上呈减少的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主要是民族在长期族际交流中的相互融合:一方面是非主体民族大量汉化;另一方面是非主体民族内部各族间融合与同化。非主体民族中各个民族群体在族源上与华夏族一样,也不是单一的,而是混合的。这种特征在北方民族尤其明显。从族源上说,北方非主体民族大体分成五个系统,也即匈奴、突厥、东胡、肃慎、西域各族。每个系统内部各族都是相互融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民族的族称消失,往往不是融进了其他民族,就是分裂成几个不同的新的民族^{[12]5-6}。西南地区各民族从早期的族源来看,“原始居民与祖国内地的原始居民在种族来源上是相同的。”^{[13]12}西南地区的民族从族源构成上说可以分成三大系统,即氐羌系统、百越系统、百

濮系统。由于非主体民族的文化相对落后于主体民族,在传统中国典籍中,其民族的早期历史已不能详考,但他们同华夏族一样,也应该有其民族与国家同构的政治组织形式。

随着族际冲突与融合,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非主体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夷”,与华夏族对立统一,形成了早期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这种早期的“夷夏”观念在大一统国家的聚散、离合和族际的进一步冲突、融合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了中国传统民族观念。

三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一统观念,二是“华夷观念”为核心的族类观念,二者并行不悖,相互因果,促成并维护庞大的多民族国家统一体。

大一统国家是与封建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所不同的国家形态。“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公羊的释义中“大一统”是指“推崇一统”,“一统就是元始”,是“自下而上的立元正始,而非自上而下的整齐划一,即统一”^{[14]352}秦汉以后,大一统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体系化,而且在实践层面上,开辟并维持了二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形态,使得“中国自秦汉至今日,可直谓为统一时代。是为中国国体与欧洲大异之一事”^{[15]21}。大一统观念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天下观,二是正统观。

“天下观”是古代中国借助“天下”、“四海”、“畿服”等概念构建起来的一种世界秩序观念^[16]。“天下观”产生的前提是“天圆地方”空间经验和华夏(汉)文化的中心地位。天下观的基本思想是,“天子”居中国之中,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只有中心与边缘之分。中心与边缘构成天下、中国与四夷构成“天下一家”。天下观在制度上面的体现就是“畿服”制原则,以“畿服”制原则,传统中国构建了一个理想中的“天下”秩序:即大一统国家内部体现等级秩序的华夷“五方格局”和大一统国家与外部世界以朝贡体系形成的“华夷秩序”。

围绕中原王朝的皇位继承和改朝换代所产生的正统与僭伪之争,形成了对中原王朝合法性认同的基础,即传统的正统观。正统观最初源自于秦汉以前的华夷民族正统理论和“君权神授”的天命观^[17],秦汉以来,随着周边民族不断进入中

原,“假中国礼乐文章”,传统的民族正统观念逐渐淡化。大至说来,作为中原合法王朝,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必须通过以下原则获得其正统地位。一是符合“德运”观,能否“改正朔、易服色”是确立中原合法统治地位的标志;二是“有德”观念,即能否按照传统的“内圣外王”统治原则和“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传统道德观治理天下;三是王位嫡长子继承制,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当然,正统观念并不是历代都能严格遵循,但是能否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辨别王朝正统性的最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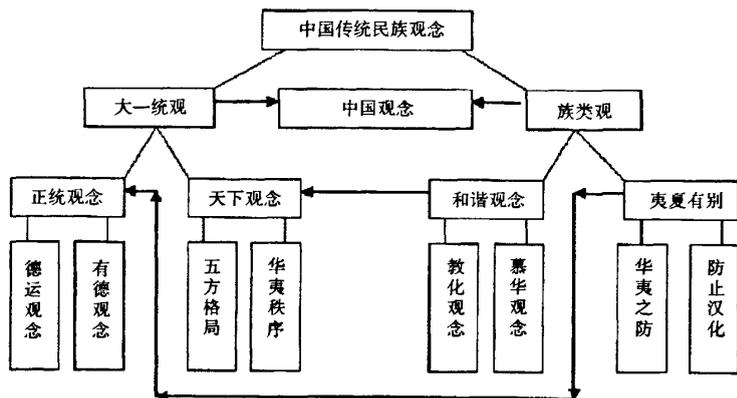
围绕“华”、“夷”关系,大一统中国在继承传统“夷夏”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传统民族观念中的族类观念。这种族类观念也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华夷和谐观念;二是“夷夏有别”观念。

华夷族类和谐观是由古代民族形成过程中本身族源的多元化和以文化差异作为辨别民族标准所决定的。华夷和谐观体现在大一统稳定时期,“华”的“夷狄”教化观和“夷”的“慕华”观两个方面。“夷狄”教化观是华夏(汉)族和向周边民族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方式,是华夏(汉)族内部道

德教化突破族际界限后,向周边民族的拓展。“夷狄”教化观“表现为以德厚夷、华夷一家、夷狄一家、以夏变夷等不同的理论形式”^[18]。同时,作为“夷”的少数民族,由于文化发展程度上的相对落后,对于中原文化的向往,使得他们往往产生一种“慕华”的观念,通过学习中原的典章、礼仪,甚至试图融入“华夏”,以改变自身的落后形象,这种“慕华”观念为促进民族间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夷”与华夏(汉)毕竟是属于不同的族群,由此决定了民族间冲突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夷夏有别”观就华夏(汉)民族而言,就是“华夷大防”,体现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就少数民族而言,就是防止“汉化”,保持本民族特性。但是“华夷大防”和防止“汉化”围绕的仍然是“文化”,事实上,“夷”接受并传承了传统文化,“华夷大防”也自然消解,而防止“汉化”也不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夷夏有别”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工具。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其与中国观念的关系可以下图表示:



其中,族类观中的民族和谐观促成了大一统观中的天下秩序,保持了大一统的有序与稳定,族类观中的“华夷有别”则以传统民族主义的形式,保证了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在保持中原文化上的正统性。大一统观和族类观相互作用,保持传统中国在文化、地理、历史上的完整性,从而把中国各民族整合到大一统国家的认同中,维护传统“中国观念”经千年而不衰。

通过对传统“中国观念”的现代阐释,我们可以发现基于东方经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观念与民族国家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民族国家”

理论中,国家的政治疆界与民族的族裔疆界是一致的,“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19]事实上,在多民族国家体系中,族裔疆界与政治疆界不可能是一致的:在传统中国历史进程中,华夏(汉)民族的政治疆界常常超出自身族裔疆界,汉族中原王朝长期统治着包括华、夷在内的各民族组成的大一统国家;而作为“夷”的非主体民族也可以入主中原,进入大一统国家的中心,将其族裔疆界扩展出其传统的统治区域。在传统“中国观念”中,多民族国家统

一体是一个由文化、历史、地域所构成的大一统国家。在这个大一统体系中,文化区别不同民族,文化又自然融合不同民族,民族通过文化认同上的一致性,实现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大一统国家的权力集中到中原王朝,各个民族按照历史传承和与中原王朝的距离,区别为郡县、属地、属国等不

同的政治单位;中原王朝统治合法性不是基于民族的族裔疆界是否超出国家政治疆界,而是基于是否按照共同认同的制度文化进行建构。强化文化认同上的一致性以淡化民族意识,使民族认同从属于国家认同,这一基本原则仍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于省吾. 释中国[M]//中华学术论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 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M]//傅杰. 王国维论学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3] 左丘明撰,杜预集解. 春秋经传集解[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 [4] 许倬云. 西周史[M]. 北京:三联书店,1994.
- [5] 方卿. 专制与秩序[D]. 上海:复旦大学,2005.
- [6] 晁福林. 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7]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C]. 北京: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8] 时蓉华,刘毅. 中国民族心理学概论[M].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
- [9] 王希恩. 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 民族研究,1995(6):92-96.
- [10] 卢勋,杨保隆.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11] 李禹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论华夏社会中民族、国家意识的同一性[J]. 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9(2):17-21.
- [12] 林幹.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M].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
- [13] 尤中. 中国西南民族史[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 [14] 蒋庆. 公羊学引论[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 [15] 梁启超. 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 [16] 上官鸿南,朱士光. 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17] 董恩林. 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J]. 史学理论研究,2005(2):13-22.
- [18] 何波. 论中国古代对“夷狄”的教化观[J]. 民族教育研究,2000(3):55-63.
- [19] 厄内斯特·盖尔纳. 民族与民族主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The Concept of Nation and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Experience in the East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LU Yong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concept of the nation - stat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is the overall country based on integrated concept of culture, history and geography. The identity of 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is the co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Interethnic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formatted the sense of natio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uring the perio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combined effect of 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ense of natio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stituted a complete "Chinese Concept"

Keywords: "China Concept"; nation - state; 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责任编辑:李 军;洪 林)